



民国的 报业巨头

亲历者讲述

QINLIZHEJIANGSHU
MGDBYJT

文 昊◎编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亲 历 者 讲 述

民国的报业巨头

文 昊 编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民国的报业巨头 / 文昊编. —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2013.1

ISBN 978 - 7 - 5034 - 3603 - 1

I. ①民… II. ①文… III. ①报业—新闻工作者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民国 IV. ①K825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56143 号

责任编辑:马合省

出版发行: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www.wenshipress.com

社 址: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100811

电 话: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010-66192703

印 装: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720×1020 1/16

印 张:25 字数:350 千字

版 次: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39.8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遥领风气之先,挑战话语霸权 (1)

当“新闻”和“报纸”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事业传入中国之后,办报之风便一度盛行。在各种各样的办报人中,除了一些抱残守缺、顽固不化、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守旧派之外,更多的则是持有新思想、新观念的维新派或革命者。尤其是那些胸怀远大抱负但却报国无门的人,更把办报作为实现自我理想的间接手段。由此,在中国近代史上便演出了一幕幕以“争夺话语权”为中心意旨的历史活剧。

首创北京第一家民间报纸的彭翼仲 (1)

章士钊主笔《苏报》始末 (24)

从陈纪怀办《天铎报》说到“竖三民报” (29)

《申报》与史量才 (37)

刘仰乾与北京的第一家晚报 (44)

邵力子与《民国日报》 (52)

胡惠生与《文汇报》 (56)

成舍我其人与《北京世界日报》 (66)

成舍我创办上海《立报》的前前后后 (90)

一代名记几多风雨,以笔为枪舍死忘生 (97)

在清末民初掌握大权的统治者,堪称集缺德、无能、卖国、腐朽等种种劣性恶德于一身的典型,因而在镇压舆论时更是残忍血腥,无所不用其极。但尽管如此,“敢为民众鼓篋”的记者仍然屡有出现,他们以笔为枪,甘愿以生命为代价对妄图独享“话语霸权”的反动统治者进行无情揭露和深刻批判。

“因报而生,为报而死”的一代报人邵飘萍	(98)
“粪土当年万户侯”的林白水遇难前后	(117)
以“新闻救国”为终生理想的史量才	(143)
史量才被军统特务暗杀的真相	(156)
罗隆基在天津《益世报》的风风雨雨	(163)
透视报业“金字招牌”,品评巨头办报之道	(181)

《大公报》是旧中国创刊较早也比较重要的报纸之一,该报的创办人是怀有维新思想的满清贵族英敛之。因其办报主旨最初是要维护清王朝的统治,故在辛亥革命后便迷失方向,不久易手于北洋军阀安福系头目王郅隆,安福系败后该报亦停刊。1926年,吴鼎昌、胡政之、张季鸾三人接办《大公报》,此后该报开始蒸蒸日上,逐渐成为旧中国报界一块难得一见的“金字招牌”。

英敛之“这个人”与旧《大公报》“这个报”	(181)
“三巨头”接手《大公报》,“哼哈二将”经营有道	(211)
张季鸾、胡政之和《大公报》研究部	(227)
我所认识的张季鸾、胡政之两先生	(232)
总揽《大公报》全局的新闻巨子胡政之	(245)
“敢捅马蜂窝”的《大公报》主笔王芸生	(270)
我四进四出《大公报》的经历	(296)
我所知道的《大公报》内情种种	(308)
国民党查封重庆《大公报》的真相	(317)
官样文章千篇一律,争权夺利不一而足	(320)

与满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相比,国民党可以说更懂得报纸的作用,蒋介石政权曾经先后办过许多官方报纸,作为宣传反动政策的“喉舌”。然而,这些官方报纸虽然拥有政治靠山和经济实力,但却毫无实际价值和发展前途,并未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报界主流。

《中央日报》从“先日报后中央”到“先中央后日报”的转变	(320)
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内的权力争斗及“先天下之溜而溜”的内幕	(337)
黄少谷是怎样借助《扫荡报》得宠“党国”的	(350)
取名“和平”、鼓吹内战的《和平日报》	(356)
我所知道的《东南日报》的兴衰	(361)
蒋介石面谕“永远停刊!”的“CC喉舌”——上海《晨报》	(375)

遥领风气之先，挑战话语霸权

当“新闻”和“报纸”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事业传入中国之后，办报之风便一度盛行。在各种各样的办报人中，除了一些抱残守缺、顽固不化、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守旧派之外，更多的则是持有新思想、新观念的维新派或革命者。尤其是那些胸怀远大抱负但却报国无门的人，更把办报作为实现自我理想的间接手段。由此，在中国近代史上便演出了一幕幕以“争夺话语权”为中心意旨的历史活剧。

在舆论批评被统治者视为禁闻的时代里，要想办好报纸不但需要先进的思想和高超的智慧，而且更需要敢于对抗强权的无畏勇气。毛泽东曾说：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，都是不怕坐牢，不怕杀头的。思想先驱们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，既包括他们“敢为天下先”的革故鼎新精神和不畏强权的不屈意志，也有从事报业经营的编辑方法和管理技巧。

首创北京第一家民间报纸的彭翼仲

凡自幼居住北京而年在六旬以上的老辈人，一提到“彭翼仲”三字，大概没有不耳熟的。其人其事虽已过去五十多年了，而在不少人中间仍然留有印象。他于1902年为北京社会首创了第一家民间报纸，随

后又陆续出版了两种报纸，倡导爱国反帝和维新改革运动，遭受摧残，身被重罪，如我后文所述。然而我今天查阅那些讲到中国报纸历史的各书，或则漏掉不提，或则止于提及报名，或虽则言及某报被封、某人被罪，却又错谬不合。至于其所从事的社会运动曾有若何影响成效，就更无只字道及。

我查阅的计有下列各书：

1. 《中国报学史》，戈公振著，1927年初版，解放后有三联书店1955年新版。
2. 《中国新闻发达史》，蒋国珍著，1927年世界书局出版。
3. 《中国新闻事业》，黄天鹏著，1932年现代书局出版。
4. 《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》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系教研室编稿。
5. 《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》，张静庐编，中华书局出版。

就这些书来看，对于过去各地报纸，还要算戈著《中国报学史》记得较详。原书第四章题为《民报勃学时期》，在北京出的日报方面，首列《京话日报》，丛报期刊方面首列《启蒙画报》，而于《中华报》亦没有漏掉，这就很对。戈著把中国民间自出报章标为“民报”，以别于官报和外报——外国传教士或洋商办的报，这种分别亦极好，官报、外报、民报其背景立场本来是迥然不同的。例如不加区别的话，北京之有近代报纸，日商《顺天时报》还早于《京话日报》。但那是有日本帝国主义作背景的，别有作用的。北京有官报则更早。唯独从中国的民间立场来说，彭先生之在北京办报乃具有首创精神，不容埋没。

然而戈著对于彭先生之被罪和他的报纸如何被封，却又言之错谬。如原书说：

光绪三十二年《中华新报》以登载军机大臣瞿鸿机卫兵抢掠事被封，主笔杭辛斋、彭翼仲递解回籍。

这里《中华新报》实为《中华报》之误。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，当时北京并没有什么《中华新报》。而且向来军机大臣在京亦未闻有什么卫兵，更没瞿的卫兵抢掠之事。当时彭先生所办《中华报》和《京话日报》同时皆被封，实别有其原因，如我后文所述。彭、杭二公最初定罪虽同是递解回籍，严加禁锢，但后来只杭公递解回籍，彭先生则是发往新疆监禁十年。所以戈著说的大多不对。

戈著所说，有的对，有的不对。其他各书则更疏漏或有误，尚不及戈著。这就使得我今天不能不来写此文了。

我和彭先生的关系非同泛泛，是有责任来作此记述的。他和我先父从年轻便交好，换帖订盟如兄弟。因为交好，彼此又做了儿女亲家，他的长女就是我的长嫂。在办报的同时，他又办了“蒙养学堂”，亲自教育儿童。学堂同报馆即设在一处（前门外五道庙路西），我就是那里的小学生，课余常常看到排版印刷。《启蒙画报》便是我自幼心爱的读物。1942年在桂林我五十岁时，曾写过一篇《我的自学小史》，叙说我既没有受过四书五经的旧教育，所受新式学校教育亦很少，一生全靠自学^①，而自学每每是从报章杂志吸取常识，引起了某一方面问题的兴趣和注意，然后再寻求专书研究。彭先生所出各报正是最初助成我自学的好资料。彭先生当年的事业和他致力社会运动，原都有我先父一份赞助力量在内，而到后来我之所以投身社会政治运动，自然亦是受他们两老的启发和感召。试问像这样，我焉能忘怀于他，不为他尽这份笔墨之力？

当我将要撰写此文，我先邀请彭先生的子女们会谈。这就是一位七十二岁的老姐姐彭清緬，还有清杰、清颐两弟兄，亦各六十多岁了。向他们征集些材料并请其帮助作些回忆。又恐怕我们这关系太亲密的人叙述易流于溢美或偏于主观，我特访老舍先生，征求意见。老舍大为赞成，鼓励我放笔写，还又介绍我访问了徐兰沅、萧长华、郝寿臣各位先生，都请他们说一说当年对于彭先生及其报纸印象如何，感想如何，希望从旁面得到一些印证或矫正。本文在后面都分别引用了他们各位的谈话。

彭先生所办的三种报

彭先生所办报纸先后计共有三种，最先办的是《启蒙画报》，开始于1902年夏间出版；其次是《京话日报》，开始于1904年阴历七月出版；又其次是《中华报》，于同年阴历十一月出版。就在《中华报》出

^① 1942年桂林有一家书店，其经理似名孙怀琮，出版一期刊名为《自学》，索我撰稿，我曾写了《我的自学小史》约两万字给他，除发表于那期刊外，并发行过单行本。



徐兰沅

版后，感觉到三种性质不同的报刊难于兼顾得来，于是把《启蒙画报》停刊了。此后便是《京话日报》和《中华报》两种在发行，直到1906年阴历八月十二同时被封为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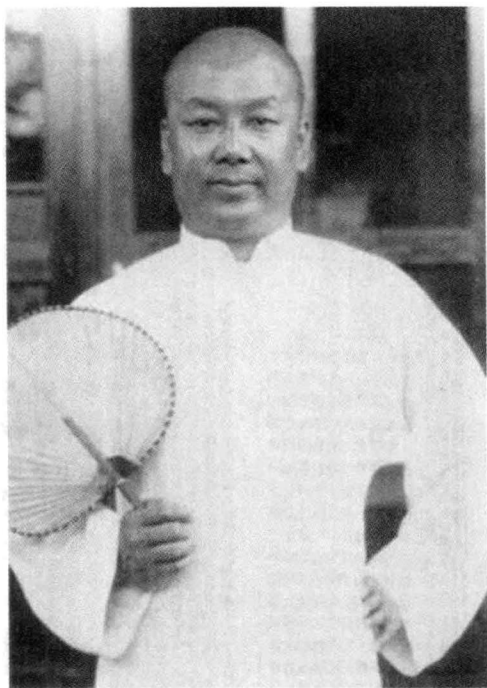
说到《启蒙画报》，徐兰沅先生极有印象，自称幼年非常爱看它。这恰同我一样。他指出它给了我们许多自然界现象的科学说明，获得一些常识而免于糊涂迷信。它原是给十岁上下儿童们看的，却是成年人看了依然有味。内容分很多门类（前后有些变动），例如天

文、地理、博物、格致（“格物致知”之省文，当时用为物理化学之总称）、算术、历史掌故、名人逸事以及“伊索寓言”一类东西都有；全用白话，全有画图。这与今天的连环画、小人书略相近而又不同。少有国王、公主、老虎、狗熊的童话，它却把科学道理撰成小故事来讲。讲到天象，或以小儿不明白，问父母，父母如何为之解答。讲到蚂蚁社会，或用两兄弟在草地上玩耍之所见来说。做算术习题，则以一个人买卖东西为缘由。讲历史，则先讲些较近的清史以至最近如庚子义和拳的经过。开初还有一门“蒙正小史”，专选些古时人物当其儿时的模范事迹来讲，儿童们看了很有益。至于名人逸事，则有如诸葛亮、司马光、范仲淹很多古人以及外国的拿破仑、华盛顿、大彼得、俾斯麦、西乡隆盛的种种故事，长篇连载。它行文之间，往往在人的精神志趣上能有所启发鼓舞，我觉得好像它一直影响我到后来。

《启蒙画报》最初是日刊一张，后改半月刊，又改旬刊，每册约二三十页。画图出于永清刘炳堂（用烺）先生手笔。刘先生作画不是旧日文人写意一派；他虽没有学过西洋画法，而自能得西画写实之妙。可惜当时只能用木板雕刻，不免僵拙，又墨印没有彩色。北京图书馆现存

有此报 1902 年和 1903 年的，而缺 1904 年份的，约计所存不足其全数三分之二。

当年对于北京社会乃至广大北方社会起着很大推动作用的，却是《京话日报》。它是全用白话文的小型报纸，内容以新闻和演说（相当于社论）为主。新闻分为本京新闻、各省新闻和紧要新闻。紧要新闻包有国内和国际的大事。它原是给一般市民看的，但当时社会的上层人士看的亦不少。彭先生所致力之爱国维新运动，主要凭借于此报。



郝寿臣

据郝寿臣先生对我谈，

他曾是《京话日报》一个热心的读者，每月累积装订成册，都保存起来，只为年代太久，又历经变乱，而今已没有了。其实这在谁家，亦难以保存得下来。幸好我从张申府先生得悉北京图书馆有存本，还是解放后图书馆从旧书摊贩手中购置的。这便让我在此文撰写上得有所资据。

《中华报》又别是一类型，不同于前者。本来彭先生念念在开民智，其眼光总是向下看广大群众的，不像康、梁之向上看朝廷政府。彭先生又是力倡白话文的（详后），认为文言极不便于大众，必须要改。但《中华报》却全是用了文言而命意在“开通官智”——这句话是彭先生自己说的^①。所以其内容除新闻消息外，以论政为主。它是专为当时社会的上层人士看的一种报。因我那时年幼，不大能看懂，就不多看它，现在对它已经印象模糊了。只记得它是订好薄薄一本的而不是一单张纸印的。北京图书馆虽存有前两种报，但却没有此报存本，大约现在无可寻觅的了。

^① 见《彭翼仲五十年历史》第四十页。



《京话日报》

《京话日报》和《中华报》之所以被封，彭先生之所以得罪，可能由于招人忌恨已久，而《中华报》的一篇报道却为事情爆发的导火线。有康、梁一党的吴道明、范履祥二人由日本回国内有所活动，在天津被袁世凯的北洋营务处（相当于军法处）秘密处死，经《中华报》以“保皇党之结果”为标题揭发出来。据彭先生的自述：

保皇党被捕杀一案，京津各报无敢言者。《中华报》访员由天津来稿，详述党人口供并暧昧处死之情形，附注云“事关重大，不负责任”。杭辛斋以稿示余。余曰：必专员赴津调查再登。专员往返五日，来稿不虚，遂决然宣布。盖当时方奉预备立宪之明诏，乃复有此暧昧杀人之事，立宪希望，岂非虚语。宁牺牲报馆之营业，以杜绝其将来，维持人道即所以维持政体也。（见《彭翼仲五十年历史》第四十六页）

这一揭发对于袁世凯，实在是他无可忍的刺激。恰好此时北京政府新设了巡警部（后改民政部），尚书徐世昌、侍郎赵秉钧，皆袁系人物。特别是赵不过一候补道员，先在天津为袁编巡警，主持警政，遽以袁之特保，越级升任侍郎。所以袁一个电报到巡警部，巡警部就命令外城警厅（当时北京分内城、外城）封报抓人。随后乃由巡警部奏明清

廷封闭报馆，将主笔人杭辛斋、彭翼仲一同课罪。

可笑的是，巡警部命令和奏折上只空洞而抽象地用了“妄议朝政，捏造谣言，附和匪党，肆为论说”十六个字，而不具体指出犯罪事实。而且这十六字明明加于《中华报》头上的，而另一《京话日报》竟亦凭空连带被封。封闭报馆的处分和彭、杭二人“即日递解回籍、交地方官严加禁锢”的处罪，皆未经任何审讯，就在部令中先予决定了。——部令到厅，厅里发出传票，票上录有部令原文，付给被拘传人阅看，所以知其如此。其上奏于朝是在下命令之后了。权臣的威力真好大呀！

隔不久，又以彭某在押所行凶为借口，转送刑部监狱。刑部改了法部，由法部奏明判发新疆监禁十年，于1907年被解往新疆。到1911年革命后，清廷既倒，民国元年彭先生才得赦回来。

1913年春，彭先生回抵北京稍事休息后，曾将《京话日报》恢复出版。但没有多久，又逢袁世凯以武力解散国会和削平南方革命党，报纸言论触犯忌讳，再遭封闭^①。经过一个时期之后，还曾作第三次出版。

第三次出版时，彭先生精神气力已有所不逮，加以北京的小型报纸此时很发达，都很讲“生意经”，使得《京话日报》甚感经营费力。有一友人吴梓箴愿意接办，即付托于他，自己退休。吴于1918年冬身故，彭先生自己重行接过来。到1921年冬彭先生病故，我和先兄试来接办。但人力财力两难维持，卒于1922年上半年停刊了^②。

这三种报纸的始末大致如上，以下将就彭先生爱国维新运动分为两段叙述。

爱国自强，反对帝国主义

彭先生的办报，全由庚子年（1900）八国联军入京，他身受洋兵

① 袁解散国会时，杭辛斋先生是国民党议员，曾为陆建章的军政法处捕去，几遭杀害。其事即在《京话日报》二次被封的同时或前后，两件事有无多少关联则不详。

② 1922年春我曾为接办《京话日报》奔走，访梁任公先生于其天津寓所，承他捐助了二百元。我又先后对李大钊、张难先两位先生谈过，希望得到人力帮助，两位先生亦各曾亲自来过报社。

欺侮险些丧命那一大刺激而来^①。他常常说，如果那次不是勇往拼性命以争，此身早已不存，现存这条白拣来的性命正好再勇干一场，一切无所吝惜，一切无所计较。于是他豪勇地走上爱国维新运动的道路。

爱国和维新在当时直是不可分开的事情，却是先出的《启蒙画报》代表着维新，而稍后出的《京话日报》则爱国反帝的色彩极其浓厚。因为他感到庚子义和拳虽代表着民族反帝正气，却可惜迷信幼稚，无补于国，所以他认定开民智最为急务。《启蒙画报》正见出他想引进科学而破除迷信这一要求。在画报中虽亦偶有“时闻”一栏对儿童谈及时事，究竟还能随时针对当前具体问题向广大社会倡导爱国反帝运动。于是他就再创办了《京话日报》。

《京话日报》开头一篇演说，只平泛地说明出报之意，不足以见其激动着的内心。真正的发刊词却见于出报七十多天后和一百多天后的报上。试摘如次：

我实实在在对众位说，我们出这《京话日报》的本心，原为的是我四万万同胞糊糊涂涂的倒有一多半，不知如今是怎样的一个局面。外国人的势力一天增长一天，简直要把我中国人当做牛马奴隶，要把我国的矿山铁路都作为他们的产业。你想想，等到那时候中国人都得听外国人的号令，如同现在埃及人、印度人一般，还有什么人味儿？但凡稍明时势的人不能不着急。心里着急，由不得嘴里要说。但单凭嘴说，能有几个人听见呢？所以赔钱费工夫做这《京话日报》，就是想要中国的人都明白现在的时势，知道外国人的用心。然却不是叫我同胞仇恨外人，学义和拳那样举动。……要人人发愤立志，……不要把国家的事当做与自己无干。

以上这一小段话，见于108号到113号六天报上的一长篇连载演说中。演说的题目是《本报得罪了德国钦差》。

原来在95号报上的紧要新闻登了“德国人在山东的举动”一段，其中说：

德国人经营山东，最注意军政上一切布置，其次便是商业。

^① 见《彭翼仲五十年历史》第三十三页。

……（胶济）铁道经过的地方皆有德国陆军来往，其用意可想而知。……在曲阜建造教堂，规模宏大如皇宫，其中兵士甚多，并有火药库、军装库，……德人设学堂专教中国人学习德国语言文字，而德人学习中国话的亦不少。……山东抚台聘德人为财政顾问，全省财赋出入尽为所知，生民命脉将落外人之手。……请大家闭眼想一想德人在山东是怎样举动。

德国驻京公使持此报纸到清政府外务部提出了交涉。

在此事之前，就有一次英国公使行文外务部为《京话日报》的言论提出交涉了。那是因为英属南非洲虐待华工，惨无人道，报纸揭载并极力反对其在京津一带以及附近各地招工；同时还将洋商汉奸在闽粤一带勾结贩卖华工的惨剧编成小说《猪仔记》，加画图连载多日。外务部为英使所迫，札飭五城公所（一种旧警政机关）勒令县甘结以后不再登载。彭先生一面从容应付，一面在报上发表一长篇演说（见于73号到76号四天的报上），其标题竟是《本报幸逢知己》。

“知己”指英国公使。为什么说他是知己呢？彭先生文中自述他在办不办《京话日报》这问题上原有些犹豫未决，只为这年（1904年）5月间亲见一批华工被送出洋，其状甚惨，深受刺激，才促成了他决心办这个报。末后就结束说：“这是我办《京话日报》的始末根由，却从没有向人说出过，现在被萨道义公使看透我的心事，岂非是一位知己吗？”

我说它真正的发刊词在报七十多天后和一百多天后，正为此。

请试想一个报纸出版不过两三个月，便引起了外强迭向这弱国政府提出交涉，其爱国反帝的精神气魄岂不可见。

更妙在彭先生的应付很得法。他对五城公所的勒令具结难以当下反抗，便先口头应承，却马上自己去见英使。英使派员接见。彭先生指出，当初中英订约招工，限定在通商口岸招募，所以你们在此外地方招工就非反对不可；至于所传虐待各情，倘非事实，请来函本报指明更正。若三日不见来函，仍将接续登下去。其结果是英使竟不再问。而官府——五城公所，倒因报纸之鼓吹，最后亦张出告示来禁止其招募，告示还在137号报上登出。

及至这次德使来向外务部麻烦时，外务部就有了经验，不再施用压力，而囑人示意报馆自行了结。彭先生又亲访德使馆，说明本报所载各节，皆从上海某某中外报纸采摘而来，只不过简略地演为白话而已。原

报如其更正，本报自必更正。同时就在那篇《本报得罪了德国钦差》演说文中，坚决表示不能屈服于帝国主义。原文说：

本报出版以来，幸得英德两公使的提倡。假如是因此封了门，把这《京话日报》永远停止，也算中国的国民与外国人争权的纪念。将来外交史上必要说道某年月日因《京话日报》记载英属南非洲招工的事，与英国钦差如何交涉；又某年月日因其记载德人在山东的势力，又与德国钦差如何交涉。怎样个起头，怎样个结果。本报就只出这一百多号，总算没白费工夫，岂不是两位钦差大臣的成全……

然而后来竟亦没有事。

其后德使又有另一次向外务部麻烦的事情。那是有一天彭先生在东交民巷口遇见德兵赶车运货回营，嫌其前面的一个中国人力车迟滞，连连举鞭痛打那车夫和车上一老者。彭先生愤其凶暴，特尾随到德国兵营，就其门岗对一对表，知是午后二时又十分钟。次日将其事在报上登出，痛论德兵无礼，警告德使非惩罚那个兵不可。德使这次还算未作过分无理要求，只说要彭先生亲去辨认那打人的德兵。外务部当然更是要彭先生自了其事。彭先生就在报上作答复说，自己当时尾追在后面，未能看见那个兵的面貌。但可能是两个德兵的右边一个，而且出事的时间地点既然都言之明确了，谅德兵营的官长应不难据以查出其人来。后来德兵营居然认真查追，惩戒了那个兵。

经过这几桩事情，《京话日报》的社会上的信誉和声价顿为之一再增高，销数由五千骤升八千，由八千而超过一万多份^①。

爱国反帝的言论在他报上随处可见，本文无须亦不可能详述。下面大略摘列其新闻或演说的一些标题出来，便可想见其概：

忠告日本内田公使（112号报）

胶济铁路（德国修建）扰民实情（119号报）

告我国人（126号报）

敬贺各国新年并预告各国使馆卫兵长官（135号报）

论近十年来中外通商情形（144号报）

^① 见《彭翼仲五十年历史》第三十八至四十页。

外患图说（157 号报）

论国债（166 号报）

法国兵不去二则（177 号报）

醉洋兵（178 号报）

俄国兵照旧逞凶（188 号报）

好霸道的日本人（195 号报）

大呼四万万同胞（196 号报）

再忠告内田公使和日本兵官（251 号报）

外国府（使馆或兵营）的势力可怕（154 号报）

抵制美国禁止华工续约（282 号报）

洋老爷（308 号报）

《京话日报》截至被封为止，共出 751 号，这里不过仅就其一小部分报纸来摘取的。

读者结合前述德兵打人之事，再从上列许多标题上一看，不难看出庚子后外国洋兵在中国的骄纵横暴，是当时令人十分头痛的一个问题。既然官府怕他们在先，散散漫漫的普通人民还有谁敢抗一抗？况且受欺的大多是劳苦大众，那是更难出头来抗的。唯独彭先生本人的侠勇，配合他的报纸这一文明武器，却让各外使不能不有所忌惮，让中国人民的积愤稍得抒快。《京话日报》和彭翼仲的名声所以传遍京城内外，首先在此。

然而要紧的还在于把爱国反帝形成一社会运动，指导人们如何去实践。这却有待于机会，看题目行事；大题目可以大做文章，小题目小做。例如：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被辱激出风潮，陈天华蹈海，遗血书以告国人；杭州惠兴女士热心教育，以身殉学；南昌知县江大令在外国教堂不屈被害，老百姓仇教，又杀了洋人；这些都连续报道其事，号召人们开会演说追悼，以至集资募捐等等，便算小题目小做。其较大的，有如美国禁止（排斥）华工，中国驻美公使与美政府交涉相持经年，不得解决，沿江沿海各埠发起抵制美货运动，北京方面就全靠《京话日报》来响应，来宣传号召。我还记得连我们这样小学生都走上街头散发传单，并向各“洋货店”（当时商店招牌即如此）检查劝告。那一次运动颇不算小，延续了亦很久。从其震动朝廷，清帝出了上谕来说，“抵制风潮过激，应加意防范，以维大局”（见 372 号报），就可知道了。

在类此反帝运动中心及南昌教案风潮中，爱国的基督教徒往往和外

国教会或其教士有许多矛盾发生。《京话日报》不止一次刊出中国人要自立教会的消息，并演说鼓吹自立教会，以摆脱外人势力（见 584 号、590 号报），这与今天的“三自运动”，颇有些暗合。

从《京话日报》自身来说，它所倡导的各次运动中声势最大的，得到了广泛响应的，莫如国民捐运动。

其起源是这样的：有一位热心的读者王子贞先生（基督教友，开设尚友照相馆），自己出资成立了“尚友讲报处”，专替《京话日报》做宣传。他在一次演讲中偶然提到庚子赔款四万万五千万银两，莫如由全国四万万同胞一次凑齐还清的话。这话原是报上曾有过的话，他就写成一篇讲词，请彭先生阅正修改，随即作为彭、王二人合稿登出来。不想马上有太医院院判张仲元投函说自己首先捐银二百两，促请速订章程办法，早见实行。接连投函者纷纷而来，有个人，亦有集体（如消防队全体官兵），不出五天，累积认捐数字便达七百几十两。于是一篇议论就这样行动具体化起来。

那篇讲稿大意说：庚子赔款言明四万万五千万两，分年偿付，要到光绪六十几年上才得还完，连利息一起便是九万万两。这是中国人的沉重负担。现在东亦加捐，西亦加捐，各项加捐，要皆为此。为了抽捐，设局所，派员役，薪水工饭开支而外，还不免若干中饱，末后民间所出的恐怕一百万万两不止。民间负担不了，难免抗捐。官说“土匪抗捐”，民说“官逼民反”。前途痛苦，不堪设想。何如全国四万万人齐心合力，赶快一次自动地凑出来，救国救民即以自救。——这样就叫它为“国民捐”。

始而报上辟出一些篇幅，标题“国民义条”四字，每天专登各方认捐的衔名、姓名或集体（仍注明各个人名）和捐数。由于认捐一天踊跃一天，所占篇幅愈来愈大，势非另想办法不可。到 426 号报上（距其开始不过五十天）即宣布其暂停，将其另印出一附张，随报附送。此后除有关国民捐的特殊提倡消息在新闻栏登出外，报上即不再见认捐人名和数字。从后来新闻中知道一些贫苦人愿捐的感人事迹，而达官贵人自捐和出面提倡的倒亦很多。例如：以庆亲王为首的五位军机大臣就都捐了；管理内务府大臣世续下堂谕于内务府三旗来提倡；学部尚书荣庆独捐一万两；吉林达将军自捐一万两，还募集了四万多元；广东岑制台、河南陈抚台皆各捐一万两。北京的佛教八大寺庙出头号召全体僧徒开会认捐，而直隶（今河北省）同乡京官全体则集合在松筠庵会商认